

中国农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

□ 许经勇

摘 要:中国农村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受压抑最严重的地方,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因此从农村率先突破。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两项伟大创造,开创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先河。中国农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。中国农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源地。

关键词:家庭承包制;乡镇企业;市场经济

中图分类号:F325.15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1-8402(2009)10-0007-04

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,人们都把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兴起,合称为中国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。正是这两项伟大创造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,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纪元,不仅使中国农村的面临发生深刻的变化,而且对推动中国的全面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农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生力军,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拓者。

一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率先突破的

对于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,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,其难度是相当大的。相对于城市而言,中国农村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压抑最严重的地方,做出奉献和牺牲最多的地方,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愿望极为强烈。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首先从农村突破的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,相对而言,城市是受益者,农村是受损者,不然的话,为何要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。相对于农村改革,城市改革的难度和阻力要大得多。如果说,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推进,那么,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更多地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进。与其相联系,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相当

程度上表现为制度需求诱导型,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更多地表现为带有强制性的制度供给主导型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率先从农村突破,并迅速打开局面,是不能单纯从政府的意志和行为来解释的。它同广大农民群众表现出来的不畏风险(包括盖手印、写血书)的自发改革积极性是有很大的关系。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其起步阶段,往往带有超前的性质,即农民群众自发构造的新制度安排,在某个时期内是超越于政府设置的制度供给范围。与其相联系,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府,而不是来自农民群众。

1978年以前,全国较大规模出现农民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的就有3次,但每一次都是被政府发动的“大批资本主义”的政治运动所扼杀掉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广大农民群众自发要求包产到户的强烈愿望的实现程度,政府是否认可起着决定性作用。1979年4月,中共中央批准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《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纪要》,对农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包产到户行动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。明确指出:“不许包产到户。”1979年9月,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口气稍微缓和一些,即“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、交通不

作者简介:许经勇(1938—),男,福建惠安人,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。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。

便的单家独户外,也不要包产到户。”1980年9月下发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,对包产到户的政策较前更为灵活一些。文件是这样表达的:“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,长期吃粮靠返销,生产靠贷款,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,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,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,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,可以包产到户,也可以包干到户,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。”“在一般地区,……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,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,就应允许继续实行,然后根据情况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,因势利导,运用各种过渡形式进一步组织起来。”由于这个文件把包产到户作为其中的一种责任制形式加以肯定,认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实行,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的就应当允许继续实行,这样一来,顺乎民心的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,犹如江河决堤,迅速漫向全国。这是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由局部实行到全面展开的重要转折。1982年1月1日,中共中央批转的《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》作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结论。文件是这样表述的:“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,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,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。”“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,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,专业承包联产计酬,联产到劳,包产到户、到组,等等,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。”1983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,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和地位给予高度的评价,指出:“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,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,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,必将使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。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,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。”
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政府对包产到户的政策,从“不许搞”到“多数地方不要搞”再到“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”再到“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的新发展”,就是一项大政策从酝酿到提出再到逐步成熟的演变轨迹。关键的一环,就是要妥善调节社会的改革需求与新经济体制供给之间的关系,使广大农民群众逐步形成一种改革预期,即新的经济体制的构建将会给自己带来不断增进的物

质利益,只有这样,新的经济制度供给才不会过剩,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才能付诸实施。就微观经济体制改革而言,在城市改革初期,城市存在着新的经济体制的制度供给过剩;在农村改革初期,农村则存在着新的经济体制的制度供给不足,即新制度需求明显大于新制度供给。这是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,当政府的政策性障碍被消除之后,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具有旺盛生命力之所在。广大农民群众是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创造者、推动者、执行者。

二、家庭承包制所引发的深刻变革

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,是实行家庭承包制,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经济基础。家庭承包制是继土地制度改革、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之后,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。而稳定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地承包关系,是土地制度的核心,农村政策的基石是解决农村所有矛盾和问题的前提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探索,终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,这就是家庭承包制。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,意味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结构,必然要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。相当长一段时间,人们都用“两权分离”、“双层经营”的理论,来概括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。而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,这种理论是带有一定的滞后性,它仅仅把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看成是经营方式的改革,而没有进一步认识到同时也是所有制改革。所有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,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、责任、刺激、动力等问题,把微观经济主体塑造成成为内有动力、外有压力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,这就必然要构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是独立的投资主体,其投资利益和风险责任,向着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、自我约束的方向转变。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,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改革了所有制结构,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接轨。

值得指出的是,中国农村广泛实行的家庭承包制,并不是采取包产到户的形式,也是采取包干到户即大包干的形式。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是有质的差别。1998年10月,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

《决定》，第一次用家庭承包经营代替家庭联产承包，是为了反映中国农村微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。包产到户是一种保留按工分分配的联产承包制形式。其主要特点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不变，实行生产队统一计划、统一分配、统一核算，将土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配到户承包经营，实行定产量、定投资、定工分，超产归己，减产赔偿。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的一个重要区别，即在实行包干到户的情况下，生产队已经不是基本的核算单位，各承包户只向国家交付农业税（已经取消了）和向集体上交公共提留，其余的产品和收入全部归农户所有，不具有联产的性质。农户成为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的基本单位。由于上交国家和集体的那部分是固定的，只要总产量和总收益增加了，农民所得的那部分就会越来越大。既然剩余的产品和收益是归农户所有，其产权的法律界限是很明晰的，不管承包户把这部分收益用于消费或者积累以及投资，均不改变个人所有权的性质。属于承包户个人所有的这部分资金或财产，从再生产的角度看，是一个能动的、可变的量，即可以不断地增值。正是通过家庭承包制的推行，把农民个人所有制引入新型合作经济中来，鼓励农民个人投工、投资，使以往纯粹的公有制变成集体所有制（主要是指土地集体所有）和个人所有制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。这就有利于充分调动农民个人积极性，把各种分散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，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生产规模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在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情况下，虽然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，但是，却永久归农户占有、支配、使用，农户还拥有转让、转租、转包等增值权利。况且，土地以外的生产要素基本上是农民个人所有。这是家庭承包制之所以能够被塑造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我发展、自我约束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，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主体，乃至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所在。实行并长期稳定家庭承包制，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才有意义，购买、出租、转包土地使用权才能有积极性。只有在长期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关系的基础上，建立起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，那些从事二、三产业的农户，才愿意把不便经营的承包地自愿有偿地转让出去，那些擅长经营农业的大户才敢放心地接包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才能发展起来。只有实行

家庭承包制，农户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，自觉地利用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显著差别，从事副业生产，发展多种经营，进城或就地务工经商办企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农民必然要逐步积累属于自己所有的经营性资产，发展自营经济，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，以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就会逐步形成起来。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，农户成为独立市场主体，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使农产品不断丰富起来，农产品供给、运输、储藏、加工、销售等产业系列服务随之发展起来，这对于建立发达的农产品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，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当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，就会利用自己的经营性资产，积极参与农业产前、产中、产后服务，专业化、商品化、市场化、现代化才会成为可能。

实行家庭承包制，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也深刻地改变着农民的地位，以及将会改变农民的身份。这是因为，伴随着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确立，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农民财产权的扩大，农民就有条件逐步摆脱传统的社会分工，并通过他们自身的劳动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。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，这就有利于中国农村逐步地由封闭走向开放，农民才不会再被隔离于工业化、城市化、现代化之外，他们身上所蕴含的能量才能充分地释放出来。以往那种封闭性的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，特别是“人”的这一因素已经充分地流动起来，已有亿万农民工进城从事二、三产业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将分期、分批地转化为市民，实现从“身份”到“契约”的根本性转变。

三、乡镇企业“异军突起”的深远意义

中国农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，突出表现在创造了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。这两项伟大创造的共同点，在于各级政府事先都没有意识到，完全是农民求生存、求发展的自发行动。邓小平在论述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时感慨地说：“农村改革中，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，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，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，搞商品经济，搞各种小型企业，异军突起。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。”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为计划经济的“异军”，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

有企业,是“正规军”。中国的乡镇企业,既不同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辅相成的国有企业,也不同于国外一般中小企业,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,体现了亿万中国农民自发地、主动地置身于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历史进程,因而,又被称为中国农民继家庭承包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。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,并不断地引向深入,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发展。如果说,家庭承包制的建立从“一统天下”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,那么,乡镇企业的发展则是在被打开缺口的计划经济体制,朝着不可逆转的市场化演进。在当时的中国经济领域里,唯有乡镇企业率先以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经营活动,即生产要素从市场中来,产品回到市场中去,形成了较为灵活的市场机制:即自主快速的决策机制,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,自负盈亏的约束机制,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,等等。这些都为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,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中国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为计划经济的“异军”,还因为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。这条缝隙是亿万农民千方百计地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岩层里挤出来的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生产资料不是商品,不能在市场上自由贸易,只能由国家统一分配。只有纳入国家计划内的所属工厂,即国有企业或准国有企业(又称大集体企业),才有可能分配到生产资料。当时农民办乡镇工业是相当艰难的。他们得不到办工业所必须的基本条件:诸如原料、技术、设备、资金等等。他们只能在已有的条件下起步。而用泥巴作原料的砖瓦业往往是乡镇企业的起点。人民公社时代发展的小型粮食加工厂和农机修理厂,成为某些乡镇企业的雏形。那些靠近大中城市的农村,他们不满足于那些低层次的建材工业,农民通过各种渠道、各种手段取得加工这些零部件的机会。请客、送礼、行贿等现象是司空见惯,这是农民挤进工业领域的“润滑剂。”
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渐进式改革。所谓渐进式改革,就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门,即国有企业改革受阻的情况下,

采取体制外改革先行战略。即面对国有经济部门改革难度大,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,在其周围培育和发展新体制和新的经济成分,并以此作为推动国民经济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。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。相对而言,城市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受益者,农民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受损者。从严格意义上说,相对于城市而言,农村是属于体制外社区。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,就其实质而言,不过是国家有效控制农村经济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。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在合法的范围内,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国有企业是没有什么差别。但是,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。即国家对农村人民公社控制、支配很严格,但却不对其控制后果承担直接的财务责任;而对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则以国家财政担保其就业、工资和福利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农村可以被视为体制外社区,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。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的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,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。没有改革初期破土而出的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,就没有今天市场取向改革的丰硕成果。即使到了今天,仍然有人对乡镇企业说三道四,但是,可以告诉他们的是,农村不发展乡镇企业,是注定富不起来的。中国农民工输出大省,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000多元,而农民工输入大省,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都在6000多元至9000多元。浙江省是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的省份,也是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,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连续24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位,2008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9258元。

参考文献:

[1]《邓小平文选》,第3卷,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第238页。

[2]吴象:《中国农村改革实录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,第180页。

[3]彭森: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》(上)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18-19页。

(作者单位:厦门大学经济学院,福建 厦门 361005)

(责任编辑:陈燕)